

·“历史政治学与中共党史研究”笔谈·

[编者按]21世纪以来,中共党史研究取得了显著的学术进展,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不重视对历史的思想分析和评论、理论分析工具欠缺、问题意识薄弱以及由此引致的政治关怀不足、理解“政治(学)”本质的能力有待提升等等,非常不利于党史研究的进一步学术化。而考虑到党史研究具有天然、强烈的政治学(史)属性以及党史研究一度属于政治学的二级学科等情况,目前方兴未艾的“历史政治学”为重新讨论党史研究的学科属性等基础问题以及寻求党史研究的学术创新提供了一大出路,也为党史研究与政治学理论的学术共进提供了发展契机。鉴于此,本刊拟开设“历史政治学与中共党史研究”学术笔谈栏目,诚挚邀请政治学界积极参与,并为政治学界参与本刊的学术发展创设一个长期、稳定的学术平台。

历史政治学的进路与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化和拓展^{*}

贺东航

中共党史学作为研究政党历史的学科,且是研究当代中国执政党的历史,其与现实政治是密切联系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是相关研究者不能回避的事实。但作为具有显著历史学特性的党史研究,也应注意运用理论分析工具,进而提出问题意识,抒发学术关怀。党史研究的对象涵盖了百年来中国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百年的中国历史发展既十分复杂又瞬息万变,某些历史事件和结局常常出人意外。要对这种复杂的历史过程进行分析,就要求研究者在党史研究中主动援借其他学科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

党史学界已经做出了一些探索和尝试,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如从人类学、文化学角度进行研究,采用历史比较法、数量分析法、分层次研究法、历史社会学路径、口述史学法、心态史学法、长时段研究法等等,有效地推动了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

目前方兴未艾的“历史政治学”既为重新讨论党史研究的学科属性等基础问题以及寻求党史研究的学术创新提供了一大出路,也为党史研究与政治学理论的学术共进提供了发展契机。一些党史研究者越来越重视历史政治学方法的运用,党史研究的新取向也促进了历史政治学的发展,为党史研究注入了新活力,打开了新视野。这种新研究方法和叙事方式既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成长的过程,也必将开拓出一些新的学术生长点,并可能对原有的一些重大课题作出更深入的结论。

一、建立“时空素养”的认识模式

中共的百年奋斗史在自然历史时间上是短暂的,但在政治时间上则是长远的。从历史时间上看,不过是两三代人的时间;但从政治时间上看,百年间的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人的组织

^{*} 本文是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的阶段性成果。

体系、观念体系、经济体系等产生了“千年大变局”，这是高度压缩的百年，其变异之快超过了之前的两千年。因此，进行时间维度的学术训练相当重要。首先，要进行时间方位的标定，从“三个100年”的时间坐标出发认识这个百年时间段的政治意义，即从1921年之前的100年、1921至2021年的100年以及2021年之后的未来100年来看中共的形成、发展及壮大的意义，分析中共领导国家制度体系的代意义，在历时性比较中更深刻地认识过去百年所发生的变化。党史研究者对于重要事件的评判应具备多重时间坐标。这里的“时间”不仅具有自然尺度，而且具有政治属性。其次，将时间从认知框架中的既定要素转变为分析中的变量，这有助于考察行为者的时间观对政治行为的影响，特别是重要决策的时间节点选择。党史中的人物囿于自己的立场和眼界，会采取不同的时间坐标来观察当时的问题，采取适当的行动。因此，只有拥有这样的“时间自觉”，才会对党史人物进行更为精确的分析和评判。

在研究中共党史时，进行空间维度的思维素养训练是另一项重要工作。相关研究者不能忽视中共领导的革命是出现在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的辽阔国土上这一基本史实。中共根据地的开辟时间不一，早至赣中的井冈山地区，晚至东北三省，加上自然环境的差异、红色资源的流动和增减以及党中央的转移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凸显了从地理学(空间)视角研究党史的重要性。英国地理学家和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提供了解释和分析历史现象的地理学视角，即分析地理位置环境与历史事件的关联性。中共自建党后能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建党时的50多名党员发展到1949年的200多万党员，与其善于利用地理环境中的有利因素及规避有害因素密切相关。例如中共中央长期驻地于上海，就是利用空间的特殊性。上海有着全国最为特殊的政治地缘环境，其辖区内的租界与华界各行其是，执行截然不同的政治和法律体系。1921年前后，上海存在着三个主权不同、管理机构相异、法律体系有别的地块，即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从而为中共进行各类政治活动提供了空间。因此，培养空间维度的学术训练，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共革命的组织 and 军事发展。

概言之，学界若想进一步拓展对党史的既有理解，建立历史政治学的“时空素养”认识模式是不可或缺的。

二、复线性而非线性的研究路径

复线思维观是相对于线性发展思维观而言的。线性思维观把时间理解为“现在”的不断逝去，这种逝去是连续的、一维的、单向的，这样的思维方式经常将历史上发生的其他重要线索遮蔽掉。同时，线性思维观本身常常是建构的、有选择性的，具有道德评判的倾向。而复线思维观则有助于研究者看到党史上的多样性。在实践层面，中共领导国家的发展就是在复合路径上行进的，这一行进过程也曾出现过特定环境下的循环往复，诸如自然灾害、执政者个人状况等部分偶然因素在特定时间对国家发展的方向与速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借助历史政治学的复线研究路径就会发现，中共的百年历程是在三重逻辑线索中出发的，交织着革命逻辑、现代化逻辑和民族复兴的逻辑。百年来，三重逻辑在不同阶段各有主导，依次展开和转换，呈现交织叠加的复杂动态过程。这三重复线逻辑储存了中共治国理政的许多特征和信息单元，从观念和组织上深刻地影响了中共的百年政治生态。在“站起来”阶段，革命逻辑发挥着主导作用，成功地实现了政权更替，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着推进文化改造，进而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中国革命带来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历史性变革，使中国社会发生了近代以来最重要的剧变。新中国成立后，中共继续保持革命基因，但其他两条逻辑也

相伴而行。先是通过抗美援朝抵抗外来入侵，巩固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迈出中华民族复兴的第一步。接着在政治建设和经济发展上开始探索现代化道路，通过5个五年计划，基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近代中国工业化从无到有的问题，开辟了东方大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富起来”阶段，现代化逻辑开始发挥主导作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中共的伟大创造，把市场经济作为实现生产社会化和现代化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在保持基本政治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加强现代行政制度建设，吸收和培养知识人才和专业人才。与此同时，其他两条逻辑也贯穿其中。通过“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面对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和平演变”，中共采取了积极的战略应对措施，巩固了政权的革命底色。与此同时，在民族大业方面，香港、澳门的回归及多个国际盛会的举办为民族复兴增添了光彩。中共十八大后，民族复兴的逻辑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但其他两条逻辑也在发挥作用。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治理反腐、政治教育等，可以观察到革命性的治理“基因”所发挥的作用。而这一阶段的现代化逻辑是“全面现代化”，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共同推进的现代化。三种逻辑成为形塑中共的“领导力”，储存了中共治国理政的许多特征和信息单元，从观念和组织上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国家的政治生态。它们在时空上会因主观因素而得到扩展或收缩，从而形成较为鲜明的中共治国理政的三阶段图。中共不断根据所拥有的资源、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等情势作出相应的战略或策略调整，主动求变。

复线的叙事策略可以在新的层次上实现党史研究的突破。这一研究路径把中共百年奋斗史的一系列具体事件融于三种线索的叙事中，从而展现出历史机制“如何”推动一系列看似无关的现象不断显现。正是在这样的从历史事实到历史现象的不断运动中，中共领导现代国家成长的生动形态从历史解释中涌现出来。因此，复线思维观可以赋予并加强党史研究的丰富性，为党史研究者提供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叙述结构，并在各种差异性的文本所形成的张力结构中，找到一种更为深入的分析模式，作出更为客观、合理、公正的评价，使党史研究既不因“小”失“大”也不因“大”失“小”，既能兼顾“宏观”和“微观”又能真正做到“向上”“向下”相结合。

三、制度变迁中的路径偶然研究

承上所论，通过对线性思维观的反思，研究者可以进一步感知历史发展的方向不是单线程的由此及彼，而是一种具有复线性的复杂过程，不排除部分偶然因素可能对特定历史发展方向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的20世纪50年代，不确定性变化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国际方面，如因抗美援朝战争而产生的中美关系急剧对抗以及对台政策变化、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等；国内方面，如庐山会议等。

众所周知，历史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体。历史必然性是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客观趋势，历史偶然性是由历史主体对历史发展可能性的自主选择。纯粹的历史必然性只存在于逻辑之中，它是在各种偶然性因素之中表现出来的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在中共历史上，有两个重要事件——遵义会议和西安事变，相关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对其历史偶然性的探讨偏弱，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

作为党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遵义会议被认为是中共由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初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虽然在组织上仍保留了亲共产国际的人员，但博古的总书记一职由张闻天取代。它能顺利召开，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毛泽东被批准参加长征是十分偶然的，中共中央

原本并不安排毛泽东参加长征。博古和李德试图剥夺毛泽东的权力,限制他的影响;也曾想把毛泽东送到莫斯科,但因当时身在苏联的王明反对而没有实现。在“三人团”决定党和江西红军转移时,负责人员去留安排的总书记博古已经把毛泽东放在了留置人员名单中。在中央红军撤离瑞金出发前,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的首长警卫员都去供给处领被装物资,就去领毛泽东的那一份,但负责发放物资的干部在供给名单上没有找到毛泽东的名字。李德的翻译伍修权在回忆录中也证实了这点^①。毛泽东看到警卫员空手回来后,立即给“三人团”和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博古分别写信,表示愿意留在苏区,不参加长征。如果当时毛泽东被留在苏区,直接影响个人的政治前途甚至生命,更不会有遵义会议的召开或会议的成功。这是因为,毛泽东不参加长征,在党和红军高层中就没有人领头发动对“三人团”的政治斗争,即便有党内同志出面斗争,也难以取得后来的效果。因此,毛泽东参加长征的偶然性,确实直接影响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和成功。

关于西安事变的研究也有大量成果,但还可以用历史政治学的路径进一步作出深入研究。这里提出一个假设,如果蒋介石没有去西安,或去西安时防备森严,就不会发生西安事变。还有,这一时期,杨虎城与蒋介石的关系正在恶化,而杨虎城与张学良的关系正在改善。由于杨虎城的西北军主要控制着西安防卫,使得张学良能说服杨虎城以兵谏这种突然形式来表明自己的抗日理念和行动。他们成功地发动了兵变,扣押了蒋介石,民国历史由此发生逆转。

就宏观来看,从1928年北伐胜利前后一直到西安事变爆发的1936年底,中国迎来一个黄金发展时期,十年内工业产值平均增长8%。魏德迈曾说过:“1927年至1937年之间,是许多在华很久的英美和各国侨民所公认的黄金十年。在这十年之中,交通进步了,经济稳定了,学校林立,教育推广,而其他方面,也多有进步的建制。”^②国家似乎要沿着这一路径发展下去,但后来的制度变迁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式。“黄金十年”突然走向1938至1948年的“崩溃十年”,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使得制度变迁的制约性因素所能发挥的作用已经退居其次,偶然性因素成为决定制度变迁方式的重要因素,从而出现制度变迁的路径偶然。偶然性变化所形成的一系列事件和结果当然不是历史事件策划者所希望的已成之事,这些事件和结果往往超出了预料和控制,这就是政治学者约翰逊和奥菲提出的制度变迁的“路径偶然理论”^③,很有理论特色。“路径偶然理论”是在对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方式进行深化研究后得出的,强调政治精英等能动性因素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不完全认同“制度遗产”在制度变迁中的决定性和持续性影响,并认为特定条件下的政策选择也具有重要的影响性^④。虽然这一理论存在明显的历史盲点,但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路径依赖理论所无法解释的问题,对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制度突然转向这类特殊现象具备一定的解释力。

当然,历史结果往往是必然的,但路径选择有时候是偶然的。对于有战略胆识的政治家来说,他们每往一个方向的发力,都会增加通向这个方向的概率,当积累到足够多的数量时,努力的方向就能把偶然转为必然。因此,我们往往会形容某些人“是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历史巨人”^⑤,就是这个道理。

① 伍修权:《我的历程(1908—1949)》,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137页。

② 《调查太平洋关系学术记录》(1951年9月19日),转引自孙玉琴等:《中国对外贸易通史》第2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51页。

③ 秦孝仪主编:《中国现代史辞典》,台北近代中国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24页。

④ 郭忠华:《新制度学派对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探索》,《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⑤ 张全景:《毛泽东是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历史巨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6年第5期。

四、“概念历史”的研究进路

在描绘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词汇中，有一些“关键词”在一定的社会和政治语境中因某种目的而不断被使用，并在形成一定的意义和指向且被固定下来后，形成了被人们所普遍接受与认可的“概念”。如果没有这样一些通用和被人们所共同接受的概念，也就没有了政治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社会并不仅仅由经济、政治等实体性内容所构成，也是由一系列概念组成的。

“概念历史”研究是指通过研究某一概念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移动、接受、转移和扩散来揭示某一概念如何成为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核心，讨论影响和形成特定概念的要素、含义及其变迁，新的概念是如何取代旧的概念等一系列内容。“概念历史”的理念主张，在人们对世界或社会不拥有任何体验与知识的前提下，概念一方面是“事实”的描述器，另一方面又是揭示“事实”的重要因素。因此，它关注哪些体验与实情被带入到概念中。简而言之，“概念历史”的研究路径就是分析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概念与实情之间关系的一致性、偏移性或差异性。运用这一研究方法，可以考察党史上出现的若干概念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变化，进而分析时代、社会和政治的结构性变化。比如，有学者认为，在党史研究中，概念是要害所在，为了复原历史事实，应当重点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人民战争”“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统一战线”等中国革命的关键概念，并注意在中共的语言与学术语言两套话语体系之间进行衔接和转换，努力发掘话语概念与史实之间的联系^①；也有学者明确提出：“党史要成为历史，要构成历史的叙事文本……无论如何都离不开语言及由语言所组成的概念的表述。”^②

当然，革命者的策略性与研究者的学术性是不同的。革命者在使用某个概念时，在叙事中一定会有革命策略方面的考虑，这样就会出现一整套的革命政党话语体系。例如，作为源自苏联语境又作用于中国革命实践的“富农”概念，在“概念历史”的研究路径中就会发现如下四点问题。其一，在俄国这样“一个很大的富裕农民阶层”是否也存在于中国的乡村社会？中共的“富农”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乡村社会原有结构？其二，中共调整“富农”政策的原因。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划分阶级阶层，因需透过对社会阶层结构的认知来寻找革命的同盟军和对手。其三，革命者内部斗争问题。对于中共来说，来自共产国际的理论与意识形态是自身存在的正当性基础。1929年共产国际的“六月来信”提出要在革命中贯彻“反富农”政策，但在现实中，要定义“富农”这一新生事物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由于“富农”不是一般概念，它涉及意识形态的建构和重塑，结果造成一系列“意外后果”，表现之一就是革命者内部斗争的加剧。其四，原来存在于地方社会中的各种宗族矛盾、私人恩怨，也会利用这一机会来重新获取对自身有利的地方格局，恰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政党意识形态的正当性表述、现实政治斗争的具体策略以及改造社会的土地政策这些复杂的历史因子也在这一过程中相互作用并得以重新配置。”^③

在党史研究中，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事实上反而能更好地解释革命政策调整与变化的背后因素，相关研究者借助“概念历史”的研究路径，有望就很多老的党史问题作出新的解释。

① 应星：《“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社会》2016年第4期。

② 郭若平：《概念史与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5期。

③ 孟庆延：《政党、政治与政策：论共产党早期革命中“富农问题”的多重逻辑》，《社会》2018年第5期。

结 语

以往党史研究的视角太窄,仅局限于中共历史本身,没有把中共的历史活动置放于整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脉络中进行重新研究,也缺乏与近代中国的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等研究形态的有效结合。利用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路径,构建“时空素养”的认识模式和复线而非线性的思维观,采用制度变迁的偶然性理论和“概念历史”的研究方法,或有助于相关研究者找出形成某些重大历史现象的复合原因,从而继续推动党史的学理性研究。事实上,党史上有很多的表述与概念,不等于就是概念所赋予的事实。作为研究者应当研究其蕴涵的意图,而不是在形式上追加或重复官语官话,否则就会造成历史分析的实际困难,而在此基础上附会的论断更会导致表面上赞誉而实质上减弱中共百年奋斗历程艰辛的后果,进而削弱中共提出特定概念策略所产生的革命绩效。

在采用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路径时,研究者难免会需要强调一些与主流党史研究不一致的研究方法,这需要创建或者借助新的用词实现精确表达,如“军事承包制”“政治势能”等,这有助于深入历史现场进行思考和学术创新。相关研究者可以通过对这类新名词展开一系列讨论,产生一系列成果,进而构建出一些更为准确、清晰、简约的词语来表达中共治国理政的百年历史与实践。

(本文作者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员 上海 200433)

历史政治学相遇中共党史研究： “党史政治学”刍议

姚中秋

历史向来是破解神话之利器、提炼理论之富矿。近年来,政治学界的一批中国学者倡导“历史政治学”,意在推动政治学转向历史,通过研究历史尤其是悠久丰富的中国历史,发展政治学理论。历史政治学所研究的历史不限于古代历史。事实上,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共党史对于在中国发展政治学理论的价值都远高于古代历史。中国共产党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精神和中国文明,“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①。也就是说,中共的丰富实践已经蕴涵了新的普遍性政治价值、组织、制度和政策,现在需要中国学界对其予以“概念化”“命题化”“结构化”。围绕这一任务,政治学科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结构性研究,但结构是历史地形成的,政治学也必须进入党的百年历史,对各种要素进行起源性和过程性研究。唯由如此二维研究所得之政治理论,才是令人信服的,故而历史政治学把中共党史视为最重要的历史性研究对象。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4页。